博士科研文献：科学思想史视角下的十七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研究

第一节. 既有的十七世纪乌托邦叙事研究

1922 年，时年 27 岁、尚未以技术史研究成名的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出版了一部乌托邦文学批评专著《乌托邦的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s*）。年轻的芒福德在该书开篇即坦言，那“引导着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前行”的兴趣，同样深深地吸引着他。在芒福德的眼中，乌托邦是“独立存在的现实”，是人类为了反对现实世界而构建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勇敢地追求着美好的生活，所以构建这个世界，首先需要人们尽情地讨论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及其所包含的至高之善和基本目标（Mumford 11-12）。总而言之，乌托邦是物质世界的另一面、“人类故事的另一半”，代表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孜孜构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无畏追求。

可芒福德惊讶地发现，乌托邦在其发展史上存在着近两千年的空白期：“自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至 16 世纪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漫长时间里，乌托邦似乎完全消失在西方世界的视野之中”（Mumford 59）——芒福德认为，乌托邦在此期间并未真的消失，而是转化成为了“乌托邦意志”（will-to-Utopia），即人内心深处对乌托邦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向往。在尤其不鼓励进取、野心和变革的整个中世纪，这种意志让乌托邦升入天空，被世人唤作“天国”。换言之，乌托邦在中世纪的存在形式是一种对现实世界听之任之的“天国乌托邦”或“逃避式乌托邦”（utopias of escape）（Mumford 15, 59, 60）。

随着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对中世纪天国的关注逐渐让位于对外部真实世界的探索，这种目光的转移不仅预示着欧洲人在忏悔之余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时也促成了乌托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回归。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又被芒福德称作“世俗乌托邦”或“重建式乌托邦”（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诞生于 16 世纪初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 1516）正是其中代表（Mumford 15）。初读《乌托邦》的引言部分，芒福德便清晰地感受到了“那股将人的心智从他们早已习惯的缓慢日常中唤醒的澎湃力量”（Mumford 60），如同该书中讲述乌托邦的葡萄牙语学者拉斐尔·希斯洛德毅然将家族财产留给其亲属，选择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出海探险、寻找新世界的那股激情。他赞叹

道：“希腊文献刚刚打开[欧洲人的]思想世界，罗盘赋予了人类探索新大陆的勇气，试想，当思想世界与新大陆迎头相撞的那一刻，乌托邦这一美好生活的新生概念，便成为了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可能”（Mumford 61）——即便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可能依然浸染着人类重返黄金时代（比如伊甸园）的欲望和愿望，但如今，这些欲望和愿望指向的已不再是彼岸天国，而是一个能被实现的现实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文艺复兴晚期、尤其是 17 世纪之后，世俗乌托邦进一步向“手段乌托邦”（utopia of means）演变。芒福德敏锐地指出，17 世纪之前的乌托邦关注的“一直是确立人类在生活中应追求的美好目标”，而自 17 世纪、尤其是培根之后的“手段乌托邦”则将确立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视为既定前提，转而探讨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特别是如何拓展人类的行动疆域（Mumford 108）。无论是德国神学家约翰·瓦伦丁·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 1619）、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 1623）抑或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都将欧洲人指引到了一个“物质层面已臻完善、足以支撑美好生活的理想之境”的入口（Mumford 85, 108; see Andreae 154）。

文艺复兴文学研究同样有助于照亮该时期的乌托邦叙事。从莎士比亚的喜剧中，著名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发现了“喜剧性行动的形式”（a form of cosmic action），并将这种形式描述为“喜剧性行动从表征着正常世界的世界（a world represented as a normal world）进入绿色世界……最终再返回前一个世界”（Frye 9-10）。在下述段落中，能找到弗莱对“绿色世界”的论述：

> 第二世界（second world）这一概念打破了米南德喜剧（Menandrine comedy）的界限，但显而易见的是，帕克所在的这个世界既非永恒形式的世界，也非神圣启示的世界……斯宾塞的史诗则是……两种存在秩序之间的对位式交织：一种是英国历史的红白世界（red and white world），另一种是《仙后》中的绿色世界（green world）。后者是一个充满骑士美德的世界，这些美德源于仙后的宫廷，并注定要在另一世界的命运得以完满实现之后回归该宫廷。莎士比亚也同样拥有属于喜剧的绿色世界和属于历史的红白世界（Frye 11）。

在论述斯宾塞的史诗时，弗莱说《仙后》中存在着“绿色世界”和“英国历史的红白世界”的对位式交织；与之类似，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同样有“属于喜剧的绿色世界”和“属于历史的红白世界”。以此观之，该段中“属于历史的红白世界”应该等同于“表征着正常世界的世界”，而该段开头处的“第二世界”则等同于“绿色世界”。若以弗莱的这一说法观照该时期的乌托邦作品，不难发现出现在作品之中的乌托邦便是与“表征着正常世界的世界”/“属于历史的红白世界”对位式交织的“绿色世界”/“第二世界”，因为它充当着“一个实现戏剧性转变的‘自然’场所”[1]（Grande and Sherbert xxix）。

然而文艺复兴文学兼艺术史学者哈里·伯杰（Harry Berger）却在1988年的《第二世界与绿色世界：文艺复兴虚构创作研究》（*Second World and Green World: Studies in Renaissance Fiction-Making*）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弗莱实际并未在该理论中区分**现实**中的“正常世界”与**虚构**中的“表征着正常世界的世界”，因为后一世界只是前一世界“在虚构作品中的形象（image）”（Berger 13-14）。换句话说，弗莱只讨论了虚构作品中的现实建构（红白世界）和纯然想象（绿色世界），而没有探讨真实的现实世界与虚构作品中的绿色世界之间的张力。

在伯杰看来，“第二世界”在使用上不应混同于“绿色世界”，因为弗莱所说的“绿色世界”只存在于虚构作品*之中*（within），但“第二世界”这个概念却可以*作为*（as）虚构作品本身。也就是说，文艺复兴“虚构作品*之中的绿色世界*”和“虚构作品*作为第二世界*”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文艺复兴思想中，这一差异存在并表现为一种显著的模糊性，伯杰认为，正是这种模糊性时而成为创作者思维混乱的根源，时而又会成为创作者创作力量的源泉，由此引发“第二世界”的定义困难：

> 以下是一些“第二世界”的例子，这些例子既能体现其涵盖范围之广、出现频率之高，也会引出一个基本的定义问题：莫尔的《乌托邦》、锡德尼的黄金世界与《阿卡迪亚》、斯宾塞的仙国、莎士比亚的绿色世界与舞台世界、马维尔的诗意花园、阿尔伯蒂作为“窗户”的绘画平面、达·芬奇笔下作为“第二自然”的绘画作品、

[1] 此处Grande和Sherbert的原文是“一个实现喜剧性转变的‘自然’场所”（a natural locale that effects a comic transformation），指绿色世界在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功能。由于笔者的分析对象是乌托邦叙事而非喜剧，因而将绿色世界造成的“喜剧性转变”在此替换为乌托邦造成的“戏剧性转变”。

> 菲拉雷特的斯福赞达城、卡斯蒂廖内的乌尔比诺、马基雅维利的假想国家、吉尔伯特的磁性地球、伽利略的实验世界，以及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描述的新世界。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把哪个称为“第二世界”？是希斯洛德的岛屿，还是莫尔的作品？是斯宾塞笔下的风景，还是他的诗歌？是莎士比亚的绿色世界，还是他的舞台世界？是吉尔伯特的类地磁石，还是他那本关于磁石的著作所构建的整体类比情境（Berger 13）？

根据伯杰的例举，文艺复兴作品中的“第二世界”既可以指代作品*之中*的某处隐遁之地（a place of withdrawal），也可以指代作为隐遁之地的整部作品*本身*（戏剧、诗歌、绘画、书籍等）（Berger 14）。与此同理，17世纪乌托邦叙事的作者们不仅在作品*之中*打造了供人隐遁的乌托邦（譬如某座与世隔绝的岛屿），整部作品*本身*亦是一个乌托邦（譬如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伯杰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情况——作品之中的乌托邦和作品本身作为乌托邦——之间动态性的相互影响，首先“需要文艺复兴创作者意识到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但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学者往往忽略了这一意识，相比之下，艺术史家和科学史家则对这一现象敏感得多”（Berger 14）。

毋宁说，伯杰的这一洞见揭示了传统文学批评与思想史之间的生疏隔膜，因为乌托邦作品之中的乌托邦（弗莱所说的绿色世界）需要批评者深入剖析文本内部的结构或修辞，而作品本身作为乌托邦（伯杰所说的第二世界）则对批评者提出了思想史层面的考察要求，正如芒福德将16世纪初莫尔《乌托邦》的出现极大地归因于航海大发现所开启的、世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或许，“现代文学学者”对这一意识的忽略应归咎于新批评主义的威权——广受新批评影响的传统文学批评者，习惯于将文本奉为独立自足的意义整体，疏忽于社会-历史语境对创作者的影响。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逐渐扭转了这一潮流，推动文本的内部研究走向了文史互证的内外结合研究，伯杰虽为新批评主义干将，但他于1988年所作的文学批评，已显示出从新批评走向新历史主义的立场转变。

而在乌托邦研究领域，欧洲乌托邦学会创始人兼前主席鲁斯·列维塔斯（Ruth Levitas）于1990年首次出版了《乌托邦之概念》（*The Concept of Utopia*, 2011[1990]）。

该书被视为当代乌托邦研究的基石之作，首版后数十年间不断增补再版。在该书的导读中，列维塔斯首先将乌托邦定义为有关美好未来的构想和值得追逐的愿景，但她紧接着申明，将乌托邦视为试图逃避现实的空想之人亦大有人在（Levitas 1）。对乌托邦一词的悖反性定义，最早可追溯至 16 世纪初莫尔借古希腊语οὐ（not）创造“乌托邦”拉丁文一词时的省音（elision），即乌托邦到底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之地（eu-topia），还是一个不存在的乌有之乡（ou-topia）[2]？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乌托邦一词最常被征用的两层含义便源自莫尔的这份遗产，也即上述省音所造成的概念分歧（Levitas 4）。

相较于日常用语中定义的相对聚焦，列维塔斯发现，乌托邦一词在专业的乌托邦研究中涵盖了“文学虚构、讽刺、幻想、科幻、宗教或世俗天堂、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或宣言、创造理想社群的小规模尝试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举国努力等诸多领域”，呈现出定义的多样化和分散化（Levitas 4）。面对不断扩大的乌托邦研究领域，她提出“乌托邦并非逃避现实的无稽之谈，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假定，提倡对形式富于变化的乌托邦展开多学科考察，因为“历史、文学、神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治理、心理学都有可能关注对我们乐于栖身之世界的再现”（Levitas 1-2）。为了将上述诸多领域统统纳入乌托邦研究，列维塔斯细致梳理并考察了乌托邦研究的不同阶段[3]，继而形成了一系列颇为鲜明的研究主张，其中包括：不能将乌托邦简单地等同于文学虚构或政治蓝图；对乌托邦之概念的考察不仅需要纳入业已改变的政治语境和乌托邦研究发展，还需加入与后者相重叠的社会理论发展；乌托邦思想在想象、希望和致力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意义上，是人类抱负和政治文化中永远存在的基本要素等（Levitas xii-xiii）。

可以看到，列维塔斯倾向于将乌托邦等同于某种社会形态[4]，尤其关注乌托邦所内含的政治愿景和社会治理维度，即是说，她对“乌托邦乃人类政治文化中永存的基本要素”

---

[2] 据《牛津英语词典》（OED），utopia 一词 1533 年才进入英语。莫尔的《乌托邦》以拉丁文首发于 1516 年，1551 年英译本方刊行面世，译者 Ralph Robynson 将标题译为“A fruteful, and pleasaunt worke of the beste state of a publyque weale, and of the newe yle called Vtopia.”; See “Utopia, N., Sense 1.a.”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P, June 2025, https://doi.org/10.1093/OED/3266324651.

3根据列维塔斯的划分，整个 1970 和 1980 年代属于乌托邦研究的早期阶段，1990 至 2000 年见证了乌托邦研究的扩张和成熟，具体表现为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的英译版为更多学者所知和阅读，乌托邦跨学科研究与日俱增等，见 Levitas, 第 xi-xii 页。

4 这点从列维塔斯 2013 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乌托邦：社会的想象性重构》（*Utopia As Method : The Imagi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一书之标题，可得到更为清晰的管窥。

予以肯定；她同时警惕“将乌托邦完全理解为文学虚构或政治蓝图”。这种倾向与列维塔斯本人的社会学出身息息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乌托邦确实与政治和社会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作为文学虚构出现的莫尔的《乌托邦》，便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均完美无暇的岛屿；那些历史上更为晚近的乌托邦，更显示出与政治环境和社会运动的强力绑定。早在 1950 年的乌托邦批评专著《乌托邦之旅》（*Journey through Utopia*）中，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玛丽·贝尔内里（Marie Louise Berneri）便发现“19 世纪乌托邦的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创立有紧密关联，有时很难区分属于乌托邦思想领域的方案和在社会改革领域涌现的方案。一部出版于这个时期、探讨社会问题的著作从未在某个时候被称为乌托邦，这种情况非常之少”（Berneri 207）。

但也正是由于社会学的受训背景，令列维塔斯意识到她在乌托邦研究上有着挂一漏万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对“对科幻小说领域缺乏关注”，还未阅读跟进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汤姆·莫伊伦（Tom Moylan）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颇具影响力的科幻研究著作（Levitas xiii）

1970 年代末，科幻研究领域的开拓性学者之一达科·苏恩文出版了《科幻小说变形记：论一种文学类型的诗学和历史》（*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1979），提出科幻小说应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认知陌生化的文学”（*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即一种在本质上具有认知性、在艺术上追求陌生化效果的文学类型（Suvin[1979] 4），从而缔造了将科幻小说作为独立文类的全新批评传统，标志着科幻批评的重大转向。该书的中译者丁素萍认为，苏恩文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不但有其文学基础，也有相应的科学基础，因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反直觉的科学发现都在当时给予了发现者及其时代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见吴岩[2008] 37-38）。

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苏恩文同样讨论了乌托邦，认为若以文学形式（而非列维塔斯的“社会形式”）的视角观之，乌托邦是“对某种类人化（quasi-human）社会的文字构建（verbal construction）；在这种[文字建构出的]社会中，社会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与个体关系将按照比作者所处社会更完美的原则组织运行，而构建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替代性历史假设（alternative historical assumptions）所产生的陌生化”（Suvin[1979] 49）。这一阐释表明，乌托邦与科幻小说在形式上同属文学虚构，而“认知性”和“陌生化”的

共同特征，则赋予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Suvin[1979] 61）。九年后，苏恩文通过《科幻小说的观念与构想》（*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1988）一书进一步明确了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亲缘关系，宣称“乌托邦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社会政治亚文类（subgenre），是社会科学小说，是一种被限制在社会政治关系领域的、又或对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建构的科幻文学”（Suvin[1988] 38; see also Suvin[1979] 14）。

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认知陌生化的文学”的独特优势，在于该定义能够“公正地呈现出一种一脉相承且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令科幻小说截然区别于非虚构乌托邦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及其他非自然主义虚构，从而为奠定科幻诗学的连贯传统创造可能”（Suvin[1979] 4）。当苏恩文试图追溯科幻小说作为独立文类的起源和构成时，他发现，这一文类实则萌芽于古希腊乃至更早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在构成上含括乌托邦、“神奇之旅”故事（fabulous voyage）、“天佑之岛”故事（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等诸多亚文类（Suvin[1979] 12）。

在苏恩文对科幻文类史的勾勒中，位于该谱系之核心的是“卢西安（Lucian, c. 125-180）-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西哈诺·贝尔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玛丽·雪莱（Mary Shelly）-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H.G. 威尔斯（H.G. Wells）”一线（Suvin[1979] 12）。可见，就在玛丽·雪莱（1797-1851）这位活跃于 19 世纪、学界公认的“科幻鼻祖”之前，这条脉络上的作家——古罗马希腊语讽刺作家卢西安、16 世纪英国的莫尔和法国的拉伯雷、17 世纪法国的贝尔热拉克以及 18 世纪英国的斯威夫特——无不是乌托邦作者。换言之，被苏恩文视为“早期科幻文学”或“前科幻文学”经典之作的，大部分都是乌托邦。

学者王瑞瑞指出，苏恩文在构建个人科幻文类史时，将乌托邦作为梳理早期科幻文学文本、追溯科幻文学起源的重要线索，由此确立了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基因（王瑞瑞 49-50, 52），更进一步而言，乌托邦可被视为苏恩文建构其科幻理论的终极视域（王瑞瑞 13, 20）。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因为苏恩文自己有言：“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示，乌托邦最终是一种视野，人性无可避免地被置于这个视野之中”（Suvin[1979] 62）。苏恩文还说，当科幻被首要理解为一种文学类型时，“乌托邦就不是预言和逃避主

义，而像许多批评家所说，是一种‘好像’（as if）、一个充满想象的实验，或‘一套为新秩序而设计的制度性工具’。文学乌托邦——所有乌托邦的描写本质上都是文学创作——是探索完美之境的启发性手段，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Suvin[1979] 52）。

如此看来，虽然乌托邦与科幻小说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5]，但二者依然能够通过认识论功能上的亲缘性达到某种统一。苏恩文特别提到，除布洛赫外，最富洞见的文学批评家，如路易斯·芒福德和诺思罗普·弗莱，都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预设了乌托邦与科幻小说之间的亲缘性乃至统一性（Suvin[1979] 12）。这一学理贡献受到了学者王峰和陈丹的高度评价，二者认为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解开了作为大众读物的科幻与其亲缘性最强的幻想故事之间的扭结，转而把科幻与乌托邦结合起来探讨”（王峰&陈丹 26）。不仅如此，在 1994 年的一篇文章中，苏恩文进一步“将[人类的]认知性发展为‘人类一切创造力都具有的潜能’，推进了科幻文学研究的乌托邦转向”（王峰&陈丹 26）。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我国科幻研究领军学者吴岩。2008 年，吴岩及其研究团队出版了《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一书，在书中广泛列举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对科幻文学的定义（吴岩[2008] 8-16）。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察觉中国学者受苏恩文影响，流露出“乌托邦应被纳入科幻文学”的观点。然而王瑞瑞指出，从该书后续章节对各国科幻发展所作的阐述来看，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明确，而这种在科幻与乌托邦之关系时出现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学界的既有共识，即“科幻文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中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之前的乌托邦文学、冒险旅行等只能是前科幻文学时代的作品”（王瑞瑞 17）。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科幻与乌托邦之间存在亲缘性（乃至统一性）的认识渐趋明朗。就在同为吴岩主编、旨在全面呈现中国科幻从起源到成熟的首部学术新作《20 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2022 首版，2026 年再版）中，中国科幻的开端之作已从晚清作者荒江钓叟 1904 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吴岩[2008] 257）被调整为梁启超 1902 年刊行的“政治小说”/“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吴岩[2022] 11, 21-23）。《新中国未来

[5] 王瑞瑞指出，乌托邦与科幻文学的不同在于乌托邦文学朝着完美性出发，科幻文学则力图在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求新，见王瑞瑞，第 49 页。

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为人熟知，“显然不存在文献新发现的问题”，那么“这篇政治乌托邦小说被纳入科幻文学，说明‘乌托邦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子类’这一观点已经逐渐成为科幻研究者的共识”（王瑞瑞 17；参见 Roberts viii; Jameson xiv）。

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科幻学界兴起的“科幻乌托邦批评”[6]，可谓更为显豁地体现出批评者淡化乌托邦的政治维度，在批评中聚焦由科学-技术想象构成的未来叙事的“科幻”批评取向。王峰和陈丹的专著《科幻乌托邦：迈向乌托邦诗学》（2023）、江玉琴的论文《科幻乌托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未来叙事》（2024）皆着手处理了这一议题，并从当代科幻作品中圈定了各自的研究对象，认为它们“最为密切地关注和预设了技术革新的未来世界”（江玉琴 162）。

然而，科技革新并非只发生在当代，就在文艺复兴转向现代的当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于 17 世纪的早期现代时期（early modern）萌发勃兴。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开始涌现前所未有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而密切关注新科学和新技术、并据此预设未来世界的重担，被乌托邦叙事一手接过。如果将乌托邦视为科幻文学中侧重社会-经济议题的亚文类需要——如詹姆逊所说——“将问题的探讨范围拓展至科幻领域”（Jameson xiv），那么聚焦乌托邦叙事中的科学-技术书写，就更需要把 17 世纪的乌托邦叙事视为构建科幻文类史的重要一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科幻研究缺乏关注的乌托邦研究者列维塔斯未能认识到历史上的乌托邦，尤其是 17 世纪乌托邦叙事中有别于政治-社会议题的其他面向，譬如受到该时期科学革命思潮激发而出现的、与“如何拓展人类行动疆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书写。换句话说，对科幻批评转向的忽视，遮蔽了列维塔斯对乌托邦与科幻存在亲缘性的认知，让她难以意识到历史上的乌托邦（尤其是 17 世纪乌托邦）在构建科幻文学传统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缺乏科幻研究视角造成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列维塔斯与苏恩文对同一部学者之作，即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所形成的不同判断上：如果说苏恩文的科幻史家身份，帮助他从芒福德之作中识别出乌托邦对构建科幻文类史的不可或缺，那么列维塔斯则只从中读

[6] 其背后是近十年来有关科幻现实主义和科幻未来主义的讨论，陈楸帆、姜振宇、彭超和吴岩都对这两个议题多有发声，相关讨论参见江玉琴，第 169 页。

解到乌托邦研究还未成气候之前[7]，芒福德经考察乌托邦所形成的那种“自由-人本主义”（liberal-humanistic）观念，即“认为演化和进步理所当然，并且醉心于理性和自由”，进而“反对国家主义，对乌托邦的威权主义倾向和激进鲁莽的社会变革药方非常警惕”的倾向（Levitas 12-13）。在列维塔斯看来，乌托邦对芒福德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其“与进步的关联以及它的社会功用”，因为芒福德所追求的是一种“充分基建于现实、但又致力于人类生存根本问题的意识形态构建”（Levitas 19），一如芒福德自己引述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çois）的看法：“乌托邦是所有进步的原则，也是创造更好未来的尝试”（Mumford 22）。然而，列维塔斯大概率不会考察有关进步的意识形态建构与科幻文学之间有何关联，因此在列维塔斯这里，乌托邦研究与 17 世纪乌托邦叙事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距离。

2006 年，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雷西（David Cressy）在历史学权威期刊《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了聚焦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 1638）的研究论文。克雷西犀利地指出，《月中人》里由若干相互交汇的思想传统塑造而成的、有关月球宜居并有生命的讨论，在科学史和天文学史领域已广为人知，在旅行史领域偶有被提及，却几乎没有得到文学研究或历史研究领域的任何关注（Cressy 965）。将这一观察推而广之，我们会发现，在文艺复兴至早期现代重要文学作者（如莎士比亚、多恩、斯宾塞和弥尔顿）的作品之外，受到该时期科学革命激发的想象之作，也即坐落在文学、科学/哲学和历史领域交汇之处的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同样未得到文学研究领域应有的关注遑论重视，而这无疑暴露出传统文学批评中科学思想史视角的从缺，正如科幻研究的方法论作为折射科学思想史视角的关键中介，仍与当代乌托邦研究存在距离。

实际上，无论是“作品之中的乌托邦”展现的具体个体意识变化，还是“作品本身作为乌托邦”表征的宏观社会思想波动，17 世纪乌托邦叙事都对批评者提出了引入科学思想史视角的考察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指责文学批评者完全忽略了这一要求也是一种言过其实，事实上，采用科学思想史视角考察乌托邦的意识，被批评者们转化为了对“乌托

[7] 即 1960 年代之前，以莫里茨·考夫曼（Moritz Kaufman），路易斯·芒福德，乔伊斯·赫茨勒（Joyce Hertzler），A.L 莫顿（A.L. Morton）等为代表所作的乌托邦评述著作，见 Levitas, 第 12 页。

邦何以在西方文学史中消失复又重现”这一现象的追问，早在 1922 年已由芒福德表述为“自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至 16 世纪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漫长时间里，乌托邦似乎完全消失在西方世界的视野之中”（Mumford 59）。而在 21 世纪，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 2005）中将这一追问表述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有趣的肯定是弄清楚为什么乌托邦会在一个时期内繁荣兴旺，而在另一个时期却销声匿迹”，因为它将“揭示生成乌托邦的可能性历史条件”（Jameson xiv）；《未来考古学》面世的同年，英国科幻作家兼研究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出版了《科幻小说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宣称科幻小说在经历了从公元 400 年至 17 世纪初大约 1100 年的中断后，重生于 1600 这一科幻文类发展史上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转折之年（Roberts 32, 36）。

综上所述，只有为“研究乌托邦意味着政治-社会批判”这一方法论观念松绑，并充分意识到 17 世纪乌托邦叙事在科幻文类史上所处的关键位置，该时期乌托邦文本内外受到科学革命运动激发所产生的科学与技术书写，才能得到解蔽和突显。因此，本研究将追随苏恩文（同时也是詹姆逊、罗伯茨和吴岩）的学术立场与学说思想，在默认科幻与乌托邦之亲缘性的前提下，将乌托邦叙事纳入科幻文学的历史脉络，以此聚焦 17 世纪乌托邦叙事中受到科学革命影响、与科幻文学更为切近的科学-技术而非政治-社会面向。通过考察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中的科学与技术书写，本研究希望揭示早期现代语境下，科学革命的勃兴如何形塑了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中的科学-技术想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构想。简言之，本研究意在探究早期现代科学革命对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中科学-技术书写的激发和影响，以及该时期英国乌托邦叙事对科学革命思潮的回应、介入乃至重构。

第二节. 科学思想史视角下的十七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研究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可谓打通乌托邦、传统文学与科幻小说的关节，因为乌托邦研究传统中的 17 世纪重要乌托邦作品，包括本研究聚焦的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英国主教兼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 1638）和英国女性作家兼自然哲学家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 1666），皆在 21 世纪以降的科幻史研究专著中跻身为 17 世纪科幻文学的代表之作（Canavan and Link xxii; James and Mendlesohn xx）。

正如詹姆逊所说，当研究者摒弃对乌托邦的个人传记式解读，转而关注历史性与集体性愿望的实现（historical and collective wish-fulfillment）（Jameson xiii），“文类”的概念便具有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生活的中介属性。在这一理论的光谱下，被纳入科幻文学的乌托邦作品不光可以说明文学结构（形式、语言、符号）的不稳定性，更与社会历史现实忧戚相关、成为了某种社会象征，因为文类的发展变化不仅是文学形式自身进行替代、适应、占用和更新的历史，也是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8]的世俗化和历史化的实践过程（Jameson 27, 32；参见王峰&陈丹 32）。可以看到，从 16 世纪文艺复兴“世俗乌托邦”到 17 世纪早期现代“手段乌托邦”的转变，便伴随着欧洲人对科学-技术愈发明显和热切的追求；17 世纪乌托邦作者针对“手段”而非“目标”的孜孜构想，无疑受到了该时期新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的不断激发，而推动上述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科学革命运动在 16 至 17 世纪的勃兴。

早在 1938 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一书中，用数据印证了 17 世纪英格兰人从文学到科学的“职业兴趣转向”。莫顿发现，相对而言，神学和人文诸学科在 17 世纪初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文学是一项人们可为之

[8] 詹姆逊将巴赫金所形容的一种观念的综合体命名为意识形态素，它不仅指某个社会阶级的集体话语的综合，而且指其多元的审美表现性的综合。巴赫金认为，在近代小说的形式内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由历史积淀下来的不同文类的共存问题。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单一地显现出某一种文类特征，各种文类特征也不可能均衡地表现在任一文学文本中，同时，这些异质的叙事范式各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并都将以自身的形式抵抗新文类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呈现出一种“复调性”，详见王峰和陈丹，第 32 页。

献身的职业，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以偶尔为之的业余嗜好。但到了该世纪中期，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可疑且反常的——文人墨客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学本身大唱赞歌，英国科学院即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青睐有加，名流显贵积极赞助科学活动，诸如此类的日常实践令科学事业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声誉日盛，逐渐跻身为社会价值的评估标尺之一（Merton 385-387）。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说法最早由法国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提出，见于其 1939 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一书的引言部分。据柯瓦雷形容，科学革命是一种“思想转变”，尤指人对自然所持观念的重要变化，其重要性仅次于古希腊宇宙论的成形和嬗变（柯瓦雷[2008] 2）。五年后，英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鲁珀特·霍尔（Alfred Rupert Hall）首次出版了以“科学革命”命名的著作《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45）。很快，“科学革命”一词成为科学史界的专有名词/概念，被学者们用来特指欧洲历史上现代科学的观念、方法论和制度得到真正奠基的一个时期。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断言，科学革命运动所带来的科学观念的变化是确凿无疑的。从最广义的层面来说，科学革命运动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彻底取代，后者不仅源远流长，更在自 12 世纪起的四百年间完全主导着西欧对自然界的认知（Westfall[2000] 45）。对科学革命进行了长期研究的英国科学史家约翰·亨利（John Henry）在《科学革命与现代科学的起源》（*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2008）一书中也明确表示，经过科学革命的洗礼，西方人抵达 18 世纪时所拥有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明显与 16 世纪初不同。换言之，在 16 世纪至 18 世纪的这两百年间，欧洲人在理解物质世界（即自然界）的性质，以及研究、分析和表现物质世界的性质等方面都展现出重大且深远的变化（Henry 1-2）。美国科学史家劳伦斯·普林西比（Lawrence Principe）同样指出，科学革命时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就自然界发问的人明显增多，人们设法设计探究自然的新方法，因此获得了大量新答案，最终导致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隐含神圣设计和无声隐喻的世界被彻底瓦解，具有宽广视野和多面经验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分科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Principe 3；参见吴国盛[2019] 209）。著名犹太思想家阿莫斯·冯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则相信，理解 17 世纪的关键必须囊括对科学革命的深入解读，因为在科学革命中，以笛卡尔、牛

顿、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机械论哲学家接受并引领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采用一种有别于前人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宇宙形象（Funkenstein 319）。

虽然科学史学界目前就科学革命的缘起、时间跨度、构成等诸多方面的界定仍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普林西比对此笑称“如果问十位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实质、时间段和影响是什么，你可能会得到十五种回答”（Principe 2），但一般而言，科学革命大约发生在 1500 至 1700 年间，也即于 16 世纪拉开序幕，17 世纪受到主要聚焦，18 世纪之后得到巩固（Henry 1; Principe 2）。标识这一运动的两座重要界碑，基本被公认为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于 16 世纪中期发表的《天球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1543）以及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于 17 世纪下半叶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1687）。

必须指出的事，虽然科学革命的“革命”一词似乎意在强调思想观念的变化甚至断裂，但早在 1930 年代研究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时，柯瓦雷便发现伽利略的“新物理学”实则建立在对前人观念的充分吸收之上，这意味着科学革命时期不断变化的思想中还蕴含着不可忽视的连续性，让科学革命更应被视为思想的“渐变”或“嬗变”，而非单纯的“骤变”或“顿变”（柯瓦雷[2008] 2）。持这种“科学革命在深具变化性的同时兼具连续性”观点的还有普林西比，普林西比主张理解科学革命首先要知道它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背景，进而指出了四个从根本上重塑了 16、17 世纪之人世界观的关键事件：人文主义的兴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即便这些事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展，但这些变化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重塑了世界图景”（Principe 4-5）。至于科学革命运动的重要成果，简而言之，包括但不限于哥白尼日心说开启的全新天文学，培根所奠定的新科学方法论（如归纳法和注重观察和实验的实验哲学），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的数学化”所塑造的机械论等等（Henry 2; Westfall[2000] 46-49）。

当氤氲着科学革命精神的时代氛围浸入 17 世纪的文学创作之中，该世纪的许多乌托邦叙事应运成为这一运动的绝佳见证者和记录者。为《剑桥科幻小说指南》撰写《科幻文类诞生前的科幻》（“Science Fiction before the Genre”）一章的英国科幻作家兼学者布莱恩·斯德波福特（Brian Stableford）便指出，17 世纪的欧洲作者开始在虚构作品中描写科学方法带来的新发现和新技术，而相较其他文学体裁，乌托邦式幻想叙事（utopian

fantasy）最为圆融地接纳了此类新兴创作，催生出“想象中的旅行”（imaginary voyage）这一典型叙事模式（Stableford 15）。

与芒福德的看法一致，斯德波福特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早在培根之前的《基督城》和《太阳城》中便有体现，但他同时指出，讲述“想象中的旅行”的悠久传统依然由新科学方法的首要倡导者之一——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开启，而其后的大多数乌托邦式幻想叙事的创作者，均会将科学-技术进步纳入创作考量之中 （Stableford 15）。虽然在斯德波福特眼中，科技进步在《新大西岛》之后的乌托邦叙事中仍处于次要地位（社会、宗教与政治改革处于中心），但对 18 世纪之后的乌托邦小说烂熟于心的芒福德却看到，西方人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会让西方世界在 17 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为科学发明家的乐园，令西方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与机械力量，远超培根或康帕内拉所能想象的极限（Mumford 108）。

被斯德波福特冠以“乌托邦式幻想叙事”的上述 17 世纪之作，被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视为一种始于古希腊的“星际惊奇之旅”（interplanetary *voyages extrodinaires*），基于这一界定，罗伯茨提出了“科幻小说复兴于 1600 年”的观点（Roberts viii-ix）。虽然罗伯茨承认并非所有乌托邦都具备科幻小说的那种“他异性意志”（Will to Otherness），“但一方面，许多科幻从业者都将乌托邦视为自身实践的一部分，并且自己也写过乌托邦作品；另一方面，科幻小说越来越关注‘世界建构’（world-building）的精妙性，作者在其中构建各种另类却又自洽的社会形态”（Roberts viii），因此罗伯茨所列举的 17 世纪“科幻小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梦》（*Somnium*, 1634）、英国加尔文主教兼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戈德温的《月中人》、法国作家西哈诺·贝尔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月球之旅》（*Voyage a la Lune*, 1655）（Roberts ix）——无不是主人公利用不同以往的手段，前往并抵达了一个比地球更为纯净完美的异世界的乌托邦式幻想叙事。

罗伯茨这一“科幻小说复兴于 1600 年”的主张，实际上遵循了著名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926 年的论断。在《科学和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6）一书的开篇，怀特海便言之凿凿地称“严格意义上开启了现代科学的第一个世纪”的关键人物，乃坚决维护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宇宙无限和多重世界学说的意大利哲学家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而布鲁诺被宗教裁

判所处以火刑、殉难于罗马鲜花广场的那年正是 1600。怀特海将布鲁诺的牺牲归因于其思想的狂野探索也即“自由的想象性推想”（free imaginative speculation）而非“真正的科学”（Whitehead 1）。从科幻史的视角出发，罗伯茨将布鲁诺式的“自由的想象性推想”解释为“科幻”（Roberts 36）。

由此可见，芒福德针对乌托邦发展史的追问（乌托邦自文艺复兴伊始重返西方文学史，从“世俗乌托邦”演变为 17 世纪的“手段乌托邦”），在罗伯茨的科幻史研究中得到了转述（以乌托邦式幻想叙事为代表的“科幻”复兴于 1600 年），因为罗伯茨所说的 17 世纪“科幻”，与芒福德眼中文艺复兴后期、尤其是 17 世纪之后旨在“拓展人类行动疆域”的“手段乌托邦”重合一致。换言之，芒福德于上世纪初所探讨的 17 世纪乌托邦，在肇始于苏恩文的理论影响下，正以“17 世纪科幻小说”或“早期科幻小说”的名义活跃于当下的科幻文学批评领域。在科幻研究领域之外，意大利哲学家、科学史家保罗·罗西（Paolo Rossi）和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玛丽·贝恩·坎贝尔（Mary Baine Campbell）皆在科学思想史的视域下，表现出对科幻批评转向的认可和接受（罗西 167; Campbell 112, 114）。

利用科学思想史之视角观照科学革命进程中的乌托邦，将带来对自 16 世纪伊始、尤其是 17 世纪的乌托邦叙事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因为该时期的乌托邦作品坐落于文学、科学/哲学与历史的交汇之处，与地理大发现、人文主义兴起等与科学革命互为推动、难以分割的重大事件紧密相关。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例，在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那里，莫尔大法官非但不是什么诚挚可敬的“日月精忠”（A Man for All Seasons），反而被讥讽为卑劣必朽的“一季之人”（A Man for One Season），伍德甚至断言，莫尔那“不想看到一个异端分子发达”的执念，令《乌托邦》沦为其“宁愿没写过”的可有可无之作（伍德 20）。

而《乌托邦》中既微妙又无处不在的讽刺，在伍德看来皆致力于“颠倒习俗”这一终极目的，得以让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穿习俗的金科玉律，原来都是任意妄为”（伍德 20）。伍德举出的经典一例，便是乌托邦的居民用金银制作最贱的物品，却把珍贵的宝石当玩具送给孩子，所以当大使不知乌托邦当地的习俗，一身富贵、挂满金链子来到岛上，岛民还以为他们是奴隶，而他们衣着朴素的仆人才是真正的使者（More 72）。此种颠倒即

是伍德所说的“所有道德讽刺的开关”，是莫尔利用乌托邦滑稽地颠覆人们“日常行为中对于道德的并不滑稽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与其说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滑稽的社会，所以伍德对此总结道，莫尔并不打算让世人生活在乌托邦，而是要世人受其合乎逻辑的嘲讽（伍德 21）。文学学者吴雅凌在谈及《乌托邦》中两相矛盾的黄金形象时，将乌托邦人对黄金的贬低，包括用黄金制造粪桶便盆、标记罪犯和奴隶，解读为黄金被视作人性的枷锁，影射人生而受囚的事实（吴雅凌 21）。

但若将视角腾挪至科学思想史领域，科学史家会告诉我们，莫尔所开的这个颠倒金属贵贱秩序的“玩笑”，亦是炼金术传统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因为受到后者影响的莫尔，主张物质所具有的“实用性”价值实则胜过物质本身的“稀有性”：

> 他们[乌托邦人]对待铸币的金银，并不将其价值抬得比金银的真实本质应得的更高。尽人皆知，金银的价值实则远低于铁，毕竟人类若缺了铁，犹如缺了水与火般难以生存；而自然赋予金银的用途，若非人类痴迷其稀有性而物以稀为贵，实则皆非必要。相反，自然这位温柔而慈爱的母亲，早已将最好、最必需之物——如空气、水和土本身——为世人显露并敞开；又将虚妄和无益之物深深藏匿，以免人类轻易触及（More 70）。

在炼金术传统中，金和银（贵金属）的本质决定了它们的珍贵、稀有以及化学层面的完美（哪怕炼金术士恐怕也未曾厘清过这三个概念之间的交互关系），但莫尔却以铁（贱金属）之于人类“如水与火”般的不可或缺，宣称铁的价值势必在虽然稀有、但却无用的金银之上。继承这一观点的还有生活在 16、17 世纪之交的英国磁学家威廉·吉尔伯特。以色列科学史家加德·弗罗伊登塔尔（Gad Freudenthal）发现，吉尔伯特虽据斥了炼金术传统中贱金属能够转化为贵金属（即不完美金属最终会嬗变为完美金属）的学说，却秉持着铁——而非金或银——才是完美金属的“荒诞”信念（Freudenthal 28）。

弗罗伊登塔尔由此认为，吉尔伯特的这一想法颇具深意地揭示出 16、17 世纪之交社会观念对金属价值秩序的介入和形塑（Freudenthal 28），更详细而言，在该时期的炼金术士与其反对者逍遥学派[9]之间，吉尔伯特站在了逍遥学派这边，接续莫尔所代表的文艺复

[9] 即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学者

兴人文主义传统，据斥炼金术士的理论基础，也即黄金才是“光泽、重量和密度更为优越，且能抵御一切腐坏的不朽之物”，大力主张对人类切实有用之物才是真正的高尚之物（Freudenthal 29）。由此观之，《乌托邦》中有关金属价值颠倒的片段不仅具有文学的道德讽刺意涵，还蕴含着重要的科学思想史意义。

综上所述，从乌托邦的发展史来看，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们不只是时人受到政治影响从而对未来社会展开的替代性想象，同时也包含着时人受到新科学——更详细而言，由科学革命所推动的新宇宙观、新科学方法论及新技术发明——激发和形塑所产生的新奇观念。在这个意义上，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犹如一座贮藏了科学革命思潮的宝库，因容纳并映射着科学革命所辐射的诸多观念流变，深具思想史价值和意义。只有将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置于连结着地理大发现、人文主义兴起等事件的科学革命连续性进程之中、作为构建科幻文学谱系的重要一环，其有别于政治-社会、关涉着“如何拓展人类的权能范围和行动疆域”的科学-技术议题才能得到解蔽和突显。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欲聚焦、考辨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中受到科学革命激发而产生的科学与技术书写，以期揭示早期现代英国人的科学-技术想象及其所助力打造的美好未来图景。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与科学革命运动的勃兴关系密切。本研究所选取的英国乌托邦文本，也即英国乌托邦领域的思想方案，无不与 17 世纪科学-技术领域涌现的新科学学说和发现以及新技术发明呼应交融。也因此，这些文本极为频繁地出现在今天的科幻史研究中，是当代科幻文学批评最常检视的 17 世纪“科幻”代表作。本文聚焦的研究对象皆在此列，如本章第二节开篇所示，它们分别是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2-1626）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英国加尔文主教兼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 1561-1633）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 1638）和英国女性作家兼自然哲学家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的《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 1666）。

在早期也即 20 世纪上半叶乌托邦研究者的界定中，构成乌托邦“核心”的文本体量颇为有限，且“核心”的形成也并非出自研究者持续使用、清晰可辨的某种标准，而是他们的惯习观点日积月累后的结果。不过，虽然在框定乌托邦的具体边界上想要达成共识殊为不易，但在确立关键性的乌托邦文本上倒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而我们会发现，《新大西岛》从未离开过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少数岿然不动的文本之一（Levitas 13-14）。在近年的科幻史研究中，《新大西岛》不再只是乌托邦研究传统中与《理想国》、《乌托邦》并驾齐驱的研究对象，而是与《月中人》一样，被收录进《剑桥科幻小说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2019）和《剑桥科幻小说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2003）的“科幻作品年表”（Canavan and Link xxii; James and Mendlesohn, xx）。《燃烧的世界》同样进入了《剑桥科幻小说指南》的评论视野，它与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夫游记》（*Gulliver's Travel*, 1726）（尤其是该作第三卷）共同被视为“反科学传统（anti-scientific tradition）的奠基之作”（Stableford 15）。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撰写上述作品的三位作者，无不深度参与又或深刻影响着科学革命运动。首先是弗兰西斯·培根，加拿大科学史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62）撰写导读时，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在科学革命这段深刻改变世界图景的运动中，“培根是革命的先知，伽利略是灯塔，牛顿则是太阳”（哈金 8），而《新大西岛》历来被公认为培根先知性的精妙体现。在《新大西岛》中，培根草拟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之宫（Salomon's House）成为日后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设计蓝图，预言了皇家学会 33 年后（1660）的正式创立。当学会早期成员如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和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追溯学会的历史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所罗门之宫认领为学会的“预言性设计方案”，不遗余力地歌颂培根对改革和发展自然哲学的伟大贡献（Glanvill c; Sprat 35-36）。用芒福德的话说，“新大西岛”的存在暗示着科学可能在“人类救赎”中发挥作用，哪怕这样的暗示只有一个字，智者（如皇家学会成员）已足以见微知著、一叶知秋（Mumford 108）。

曾任英国赫里福德和兰达夫（Hereford and Llandaff）两地主教的弗兰西斯·戈德温，身兼历史学家和古文物学家之职，还一度担任过著名地理志学者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的助手。戈德温 1578 年（17 岁）入读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1581 年完成学士学业，1584 年取得硕士学位。就在他攻读硕士的 1583 年，流亡英国的布鲁诺造访牛津大学，在牛津宣讲了他的无限宇宙和多重世界学说。不知是否因为这一时间上的重合，牛津古文物学家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在 1692 年的传记性辞典《牛津名人录》（*Athenae Oxonienses*）里，将《月中人》称为戈德温“尚在基督堂学院求学期间，借多明戈·冈萨雷斯（Domingo Gonsales）之假名所作”（Wood 558）。

上世纪 50 年代，知名布鲁诺研究学者多萝西·韦利·辛格（Dorothy Waley Singer）作出了与安东尼·伍德类似的推断：“当布鲁诺 1583 年在牛津时，一位年轻的基督堂学院学生弗兰西斯·戈德温正在攻读他的硕士学位。戈德温听闻了布鲁诺——这位在大学里掀起轩然大波的粗野外国人——的言论，旋即就整个事件撰写了一则幽默讽刺剧《月中人》”（Singer 183）。然而根据最新的文献考据显示，《月中人》主人公冈萨雷斯的亲身经历与一系列新天文学学说和发现相呼应，令该作显示出典型的 17 世纪特征[10]（Poole 17）。可以说，戈德温对同时代诸多知名新科学学者，包括磁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涉猎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等人作品的广泛征引，是极为引人注目且值得深究的。

相较于生活在 16、17 世纪之交的上述两位男性作者，活跃于 17 世纪中叶的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则经历了英国内战、无王时期（inter-regnum）及查理二世复辟。作为 17 世纪英国本就罕见的女性作家，卡文迪什不仅坚持具名发表，还“离经叛道”地痴迷于新科学。在其长达 20 年（1653-1673）的写作生涯之中，卡文迪什出版了不计再版在内的五部自然哲学专著[11]，让她在作家的身份之外获得了自然哲学家的头衔。就在她撰写《燃烧的

---

[10] 在 2009 年出版的《月中人》最新单行本注本中，编注者 William Poole 已在导读中详细驳斥了 Singer 的论断，以缜密的文献考据将该作的书写年份定位于 1628 年之后，见 Poole[2009], 第 17-24 页。值得一提的是，王骁 2024 年的论文《<月中人>与 17 世纪英格兰的月亮书写》通过援引 Campbell 对 Singer 的转引，重申了 Singer 的论断，虽然他在后文提及《月中人》的创作时间在“1630 年左右”，但本文想再次强调 Singer 过于“想当然”（Campbell 语）的推断已被 Poole 否定，见王骁，第 239 页。

[11] 卡文迪什生前首次出版的作品共计 15 部，文类涵盖诗歌、戏剧、演说、自传等，其中的五部自然哲学作品分别是 1653 年的《哲学幻想集》(*Philosophical Fancies*), 1655 年的《哲学与物理意见》(*Philosophical and Physical Opinions*), 1664 年的《哲学书信集》(*Philosophical Letters*), 1666 年的《实验哲学观察》(*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和 1668 年的《自然哲学的基础》(*Grounds of Natural Philosophy*)。

世界》的 17 世纪 60 年代，她那有别于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哲学的原创性自然哲学思想臻至成熟，令她的文学作品《燃烧的世界》中遍布着迷人的哲思。

可以说，培根、戈德温和卡文迪什皆属于科学革命运动中或突出或一度受到忽视的代表性人物，且都在本研究所考察的乌托邦叙事中灵活地化用了来自新科学的发现、方法论和学说，以架构各自的故事背景、推进故事情节或探讨自然现象。这些有关科学和技术的书写，反映出他们对日益兴起的科学活动实践及日渐风行的科学话语的敏锐和开放。

当前，国内学界就《新大西岛》关注较多，《月中人》和《燃烧的世界》则严重不足，这导致有关后两部作品的中文讨论和研究极为稀少。就《新大西岛》而言，收录于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论文显示出研究者对该作中的科学精神（如安龙泉，2001）、政治制度（如黄泉，2012）、乌托邦（如王双洪，2022）、科学建制（如于京东，2024）等议题的考察。学术译著方面，由李丽辉翻译的金伯利·H. 哈勒（Kimberly Hurd Hale）的《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中的<新大西岛>》（*Francis Bacon's New Atlantis i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020[2013]）从政治学和科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梳理了培根思想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新大西岛》在现代政治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价值。虽然以《新大西岛》为绝对中心的译著较为有限，但一旦将论及《新大西岛》的培根研究囊括进来，相关文献的体量则顷刻蔚为大观，如刘小枫主编、李致远等译的朗佩特之作《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笛卡尔与尼采》（1995），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培根思想在古今之争中的地位；张沛的《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2021）从修辞的角度剖析了培根在《新大西岛》中传布的新哲学福音[12]；程志敏选编、方云箭翻译的《迷宫的线团——培根自然哲学著作选》（2025）意图通过展示培根的自然哲学思想，揭示培根蕴含在《新大西岛》中为人类生活创造福祉，以此提升人类生存境况的终极哲学愿景。总而言之，《新大西岛》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培根研究中甚少缺席，始终徘徊在相关讨论的中心或边缘处。

至于《新大西岛》的国外研究，则更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以《新大西岛》为绝对中心的论文不胜枚举[13]，2002 年由布朗温·普莱斯（Bronwen Price）主编的《弗兰

[12] 同样参见张沛《培根的寓言》，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 1 期，第 180-191 页。

[13] 简要例举其中一些历久弥新之作，如 Blodgett, Eleanor Dickinson. 'Campanella and the *New Atlantis*.' *PMLA*, vol. 46, no.3, 1931, pp. 763–780; Bierman, Judah.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New Atlantis*.' *PMLA*, vol. 78, no. 5,

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全新跨学科论文集》（*Francis Bacon's New Atlanti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更是以丰富多样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彰显并证实了《新大西岛》在阐释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多义性。虽然以《新大西岛》为绝对中心的学术专著较为有限，但从意大利科学史家保罗·罗西（Paolo Rossi）的《弗兰西斯·培根：从魔法到科学》（*Francis Bacon: From Magic to Science*, 1968[1957]），美国政治学家杰里·魏因博格（Jerry Weinberger）的《科学，信仰与政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性的乌托邦根源》（*Science, Faith and Politics: Francis Bacon and the Utopian Roots of the Modern Age*, 1985），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马丁（Julian Martin）的《弗兰西斯·培根、国家和自然哲学革命》（*Francis Bacon, the State and the Reform of Natural Philosophy*, 1992），法国思想史家皮埃尔·阿多的《伊西丝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Le voile d'Isis: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dée de Nature*, 2004），再到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萨拉·厄文（Sarah Irving）的《自然科学与大英帝国的起源》（*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2008）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来看，《新大西岛》都是论述培根思想乃至他所奠基的现代性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虑到培根一生论述颇丰的哲学和法学之作，《新大西岛》作为一篇至多中篇体量的文学作品所收获的源源不绝的关注和讨论，昭彰着它对于理解培根之思想和他所处时代的至关重要性。

与《新大西岛》相比，国内学界对《月中人》和《燃烧的世界》则严重关注不足，这种不足部分体现在现有高质量研究论著的稀缺甚至空白上。截止目前，聚焦《月中人》的中文核心论文只有王骁的《<月中人>与 17 世纪英格兰的月亮书写》（2024），陈西军在《古今之争、对跖地与笛福<联合机>的中国反讽》（2025）中援引王骁之作，以增补论据的方式简略提及了戈德温和《月中人》[14]。

但在 17 世纪，这部戈德温身故五年（1638）后问世的月球乌托邦作品，一经发行便反响热烈，被陆续译为荷兰语（1645）、法语（1648）和德语（1659），至 1718 年至少有 12 个欧陆版（Continental editions）存世（Cressy 970）。就该作的地位而言，克雷西认为《月中人》与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同年稍晚出版的科学论著

1963, pp. 492–500; Albanese, Denis. 'The *New Atlantis* and the Uses of Utopia.' *ELH*, vol, 57, no. 3, 1990, pp. 503–528。

[14] 见陈西军，第 250-251 页。

《发现月球世界》（*The 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 1638）共同构筑起“英格兰的月球时刻”，引发了欧洲此后对月球绵延不断的思辨和探索（Cressy 967, 980, 982）。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学者普尔则称，从 17 世纪的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到现当代“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H.G.威尔斯（H.G. Wells），数十位作家都受到了《月中人》的影响（Poole[2009] 16）。

上世纪 30 年代，学者格兰特·麦考利（Grant McColley）在《史密斯学院现代语言研究》（*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Modern Languages*）上刊发了《月中人》的现代编注本[15]，标志着这部作品重获学界关注。1984 年，法国学者安妮·阿马尔坦-瑟兰（Annie Amartin-Serin）推出了《月中人》的法语编注本[16]。不同于牛津古文物学者安东尼·伍德 1692 年之说，具有科学史学术背景的麦考利在 1937 年时推断《月中人》应创作于 1620 年代末，而非伍德所说的 1580 年代（Poole[2009] 17）。围绕这一争议，詹姆斯·R·诺尔森（James R. Knowlson）、马丁·比奇（Martin Beech）、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等学者分别于 1968 年、2001 年和 2009 年撰文回应，充分讨论并逐渐厘清了《月中人》里涉及新科学学说与发现的诸多疑点。普尔更于 2009 年出版《月中人》单行本编注本，在导言中断言该作应创作于“1628 年之后”，从而将《月中人》校准为一部“六旬主教之作”（see Poole[2009] 17-24）。

围绕《燃烧的世界》的中文核心论文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知网检索后只得到骆长捷（2020）对卡文迪什自然哲学的简要概述，邢锋萍（2023）针对卡文迪什自然哲学研究专著撰写的一篇书评，以及郝田虎和舒好（2024）有关《燃烧的世界》的科幻诗学探讨。不过，卡文迪什在英国女性小说史上的地位并未被忽略，李维屏、宋建福等学者在《英国女性小说史》（2011）一书中梳理英国女性小说的起源时，不忘向读者介绍卡文迪什及其作品[17]。两位学者赞美卡文迪什“勇敢地为女性创作开辟了通道”，评价《燃烧的世界》“可算作科幻小说的先驱”。就后人指责该作“有欠精当和不够科学”，两位学者作出了

---

[15] McColley, Grant, editor. “The Man in the Moone and Nvncivs Inanimatvs.”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Modern Languages,* vol. 19, 1937.

[16] Amartin-Serin, Annie, editor. *L’Homme dans la Lu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84.

[17] 见李维屏、宋建福，第 17-20 页。

“对于 300 多年之后的《星球大战》等作品，[我们]同样不可过于当真”的辩护（李维屏&宋建福 20）。

与国内讨论寥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外学界近 30 年来对这两部作品与日俱增的兴趣和愈加深入的开掘。得益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先锋的女性主义意识和出色的文学评论才能，卡文迪什在经历了 18 和 19 世纪的湮没无闻之后，于 20 世纪初重获关注。伍尔夫不仅在 1925 年出版的《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中为这位“纽卡斯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Newcastle）作传[18]，褒扬她“高贵、活泼、堂吉诃德式”的精神（Woolf[1925] 111）、肯定她早期诗歌中“那种新鲜别致的幻想”（Woolf[1925] 109），还在四年后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里再次哀叹时代对卡文迪什的限制乃至禁锢，感慨“手中本该有一台显微镜，本该学习如何观察天体，如何科学理性地思考”的卡文迪什沉溺于书写荒唐的“废话”和“失误”（Woolf[1929] 92）。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历史学者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对卡文迪什的重新发现，不仅令卡文迪什的作家声名得到传扬，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自然哲学家身份。著名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于 1980 年出版了开创性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在书中的《女性与新哲学》（“Women and New Philosophy”）一节介绍了卡文迪什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在概述《燃烧的世界》的情节时指出，皇家学会出于性别原因将卡文迪什拒之门外，直接激发了后者在该作中“发明创造自己的科研中心”，表达了“对科学最早的女性主义明确观点”（Merchant 271-272）。八十年代末，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史领域的奠基性学者朗达·希宾格（Londa Schiebinger）出版《心灵不分性别？——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女性》（*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989）一书，专门探讨了性别在科学发展和知识建构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卡文迪什在早期现代科学制度形成过程中遭受到的系统性排斥（Schiebinger 47-59）。

---

[18]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原名玛格丽特·卢卡斯（Margaret Lucas），是卢卡斯家的第 8 个孩子，因嫁给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而改夫姓，并在丈夫 1665 年获封“纽卡斯尔公爵”头衔后，被人尊称为纽卡斯尔公爵夫人。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中的传记便以《纽卡斯尔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Newcastle”）命名。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卡文迪什研究逐渐发展为显学。牛津版《十七世纪小说选集》（*An Anthology of Seventeenth-Century Fiction*, 1991）的编者将《燃烧的世界》誉为“开创性的女性乌托邦，甚至女性主义乌托邦”（Salzman xix）。卡文迪什研究学者瑞贝卡·麦伦斯（Rebecca Merrens）不满既有的女性主义论述，于 1996 年撰文，进一步拓展了卡文迪什的自然哲学思想谱系。1997 年，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学会（Margaret Cavendish Society）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卡文迪什研究的热潮，令涵盖小说、戏剧、哲学、诗歌和书信等诸多文体的卡文迪什作品得到校订和出版（K. Whitaker 359），卡文迪什的知名度由此大幅提升。在“卡文迪什热”的影响下，《燃烧的世界》迅速进入不同领域的学者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研究焦点[19]。

作为欧洲 17 世纪 3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涌现出的“天界之旅”作品，《月中人》和《燃烧的世界》在意大利科学史家罗西（Paolo Rossi）的《现代科学的诞生》（*La Nascita della Scienza Moderna in Europa*, 1997）一书中，被罗西誉为“将天界之旅（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幻小说’）、哲学、道德和天文学主题融为一体的典范”（罗西 167）[20]。同一时期，美国知名比较文学学者玛丽·贝恩·坎贝尔（Mary Baine Campbell）出版了跨学科批评专著《奇迹与科学：在早期现代欧洲想象世界》（*Wonder and Science: Imagining World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9）。坎贝尔在书中探讨该时期欧洲的虚构和类虚构（quasi-fictional）作品时，同样将 17 世纪的乌托邦叙事视作“科幻小说的一支”，称“承载着信息、发明和认识论功能的《月中人》和《燃烧的世界》”可供用来考察欧洲文学史上“科幻小说是否早于现实主义小说”的问题（Campbell 112, 114）。

罗西和坎贝尔的先见，已然就“将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置入科学革命进程予以考察”提出了要求，而这一要求的正当性正在于，科学和文学这两个如今泾渭分明的领域在当时依然彼此交叠，更进一步而言，诸多今天的细分领域和学科在当时远未分化——自然哲学家仍在哲学/科学写作中找寻和借鉴来自文学的新策略和新技巧，诗人和作家也在向自然哲学、尤其是新天文学积极寻求创作灵感。因此，从传统文学批评或乌托邦政治-社

---

[19] Marina Leslie（1998, 2012）, Lisa Walters（2014）, Lisa T. Sarasohn（2010）, Deborah Boyle（2018）等学者都发表过针对《燃烧的世界》的研究论文或学术专著，出版信息参见本文参考文献。

[20] 不过罗西认为，比《月中人》还要早四年发表的开普勒的《梦》“标志着从关于月亮的‘幻想’文学[受卢西安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启发]转向了‘科幻小说’”，且将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启发包括凡尔纳和威尔斯在内的众多科幻作家对月球之旅的创作，见罗西，第 165 页。

会批判转向科学思想史视角下科学革命与乌托邦叙事的互涉研究，势必将带来对于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在这一方法论下，法国学者弗莱德里克·艾特-图阿蒂（Frederique Ait-Touati）于 2011 年出版了《虚构宇宙：十七世纪的科学与文学》（*Fictions of Cosmos: Scienc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在该书中，艾特-图阿蒂兼涉科学史与文学研究，探讨了文学虚构与天文学理论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考察开普勒、戈德温、贝尔热拉克、卡文迪什、丰特奈尔等人的作品，强调了科学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多重相互借用。2020 年，美国学者艾琳·韦伯（Erin Webster）出版了《好奇之眼：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光学与想象文学》（*The Curious Eye: Optics a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通过将培根、弥尔顿、卡文迪什和阿芙拉·贝恩的文学作品与开普勒、笛卡尔、胡克、波义耳和牛顿的光学及哲学论著并置考察，深入探讨了十七世纪新光学技术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2017 年以论文集形式出版的《帕尔格雷夫早期现代文学与科学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and Science*），提出了将关注焦点从追问文学作者如何回应科学作者转向文学实践与科学实践的交互研究，通过收录该领域顶尖学者撰写的 24 篇论文，促成了一系列看似关联甚微的结合：物理学与修辞学、数学与弥尔顿、波义耳与《圣经》、瘟疫与戏剧等等，揭示出该时期的哲学写作常常大行隐喻、机智和想象之能事，文学则为哲学家思考物理学、数学和医学提供了实质形式和修辞策略。

因此，本研究欲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下聚焦培根的《新大西岛》、戈德温的《月中人》和卡文迪什的《燃烧的世界》这三部 17 世纪英国乌托邦叙事，通过结合早期现代传统宇宙论与新天文学的古今之争、层出不穷的新科学学说与发现，以及普及之中的新技术发明，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辨析三部作品中的科学-技术相关议题，主要包括世界和宇宙图景的变化、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人类自然观念的变化，以及培根所号召创建的“人类帝国”的历史仪轨，进而揭示出乌托邦的物理边界从月下物质世界向月上精神世界的突破与持续扩张；17 世纪英国人从欧洲走向世界、从地球进发宇宙的乐观主义时代精神；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机械技艺对人类阐释自然、改造自然乃至统治自然的自然观念形塑；英国人围绕培根的“人类帝国”，也即“以科学-技术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这一历史使命所付诸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欧洲殖民者的叙事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固化。